

管窥蠡测

藏书文化与人文精神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它的核心则是“仁人爱物”。所谓“仁人”便是把书的作用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结起来，使所藏尽量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从官藏来看，早在老子主管周藏室时，便曾热情地接待孔子来查阅百二十国史记，彼此还进行了学术研讨。魏晋时期，国家藏书还曾应读者的借阅要求而赠书的，如西晋皇甫谧向晋武帝借书，武帝应求赠书一车。唐宋各代也将官藏作部分开放，如北宋的官藏即向一些官员开放，如因工作需要还可经过一定手续外借。清代尤注重官藏利用问题，在四库全书纂修以前，多位学者就有机会抄录官藏《永乐大典》所收各书 有一些重要而散佚的著作得到抢救。学者全祖望、徐松等都做过抄录工作 而《宋会要稿》之类的重要

典籍因此得以流传。《永乐大典》还被《四库全书》作为采录佚书的来源之一，使古代文化能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四库全书》修成后，不仅北京文渊阁可有条件地备人参阅，更在南北要地分建六阁，以便各地士人就近抄用，嘉惠士林，保存和普及文化，所尽仁人之心，功不可没。公藏如书院之藏书本以供士子阅读为主旨，自不待言。至私藏之体现仁人之心更为显著。东汉末年学者蔡邕私藏近万卷，当他发现王粲是一位文采斐然的好学之士，虽然其女蔡琰也颇有学识，但他还是要将藏书数千卷赠予王粲以作育人才（《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宋晁公武之所以能写出一部私家目录名著——《郡斋读书志》，也是得力于他得到四川转运使井度的慷慨赠书五十筐，使晁公武合个人私藏，然后去其重得 24500 余卷，乃录诸书要旨而成《郡斋读书志》，体现了藏书文化的仁人效果。藏书文化的仁人精神不只局限于汉民族圈，也润泽着周边各民族，并循着文化同化律的趋势发展。辽、金、夏各族以本民族文字大量翻译汉籍，与当时各民族的政治民生密切相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元 1190 年由西夏编成的《蕃汉合时掌中珠》是汉夏、夏汉的对译字典，在夏字旁注汉字读音与汉字释义，汉字旁注夏字对音和译语，两两对照，极便检阅，对沟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起了重要作用。元朝也很注重提倡藏书文化，译书有《通鉴》、《九经》、《贞观政要》等等。其文种之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已超越前代。尤其是设立秘书监的分监，颇类似图书馆的分馆，也可视作一种流动图书馆。分监原是随着皇帝去上都避暑时带一些备参阅的政书和类书，但因年年如此，也便形成固定的制度。运书既有苇席、柳箱的包装，又有专人押送，并可经过严格的手续在一定

范围内流通 这是前此所没有的措施 王士点：《元秘书监志》卷三）

有些藏书家为了发扬藏书文化的‘仁人’精神 亲自为人办理藏书借阅，如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家借书，他都‘亲自取与 未尝为辞’（《南史·崔慰祖传》），有些人如晋范蔚藏书 7000 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他不仅提供阅读 还为读者‘置办衣食’（《晋书·范蔚传》），明清两代不少藏书家逐渐树立外借流通的观念，如明末藏书家李如之一就是持‘天下好书 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观念 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 必贻书相闻 有所求借 则朝发而夕至’（钱谦益：《跋陶南村 草莽私乘 第二跋》），杨循吉的《题书橱诗》更直抒‘朋友有读者 悉当相奉捐’的慷慨气度。许多藏书家都把借阅抄录作为丰富知识，扩大藏书的一种方法，如世学堂纽氏、澹生堂祁氏、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天一阁范氏等大藏书楼都曾接待著名学者黄宗羲进楼抄书。黄氏也不忘所本 真诚地名其藏书处为‘钞书堂’以志来源。黄氏之成为清初大学者未始不得力于此。藏书文化亦随之而大放异彩。

藏书文化的爱物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图书的爱护上。从汉代开始 就用竹制小箱子（篋）将图书分类置放 以免损失破坏 东汉发明造纸术后 使藏书保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如用槧将纸染黄后再用以防蠹（刘熙载：《释名》），魏晋时代有一个名叫曹曾的人，家多藏书，他为此修了一个石窟以藏书，称为曹氏书仓。隋朝是藏书文化趋于高潮的时期，它虽立国日浅，炀帝又是后世所非议的人物；但他爱护图书的心极强 而为史籍所称道 如《旧唐书·经籍志》即盛称：“炀帝好学 喜

聚异书 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甚至博学如宋人郑樵也在其所著《图谱略》中极称“隋家藏书富于古今”。它不仅注意典藏，还对图书的形制爱护备至，曾精选其正御本写五十副本，分上中下三品，用不同颜色的卷轴分藏书室，并建立起能自动启合的门窗和书橱等设施。唐承隋风，私藏图书超出万卷者已不在少数，而爱惜图书者更非个别。如李泌藏书三万余卷，对经史子集分别标红绿白三色以区别藏书质量。宋代除注重图书形制外表的保护改进外，还对图书的内容进行纠谬正误的校勘工作，由崇文院总管秘阁和内府藏书的整理和校勘，并规定每日日课数量，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如曾巩、苏颂、黄伯思等都对校订官藏有所贡献，为后世留下重要的经验。学者对个人私藏尤加用心，宋敏求家多善本，颇着意于校书，更利用这些珍本文献著书立说，成为一代著名学者。尤袤著《遂初堂书目》著录图籍的各种版本，开版本学研究之先河。明代范钦精心营建的宁波天一阁，是至今巍然独存四百多年的古代图书馆，在它二百年后的清乾隆帝为四库全书建阁存书时犹命地方督抚绘制天一阁图纸作建阁依据。它不仅拥有七万余册的藏书量，被誉为藏书天下第一家，而且对爱护图书作了多方面的设想，如防火、防蠹、防潮、防散失等措施，更是蜚声海内外，为世人所称道，充分体现了藏书文化的爱物精神。其他许多藏书家也多注重图书的装订、刊印和收藏，是可见藏书文化精神的普及程度。尤其是对古善珍稀的典籍更视若拱璧，不惜巨资大量地精工传抄，因而有吴抄、文抄、王抄、沈抄、姚抄、祁抄、谢抄和毛抄等著名抄家，特别是毛抄更是驰名遐迩，后世所谓毛边纸之称就是毛氏抄书的专用纸张。这种一时成风的抄书活动的文化现象极大地丰富

了藏书文化的内涵，应给以充分的研究。清初以来，藏书文化有显然的长足发展，不仅官藏、公藏注重搜求典藏，还由政府组织了工程浩大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有选择地概括了古代、中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将抄本分置在自东北至东南的繁盛之地。私藏尤为普遍，几乎凡是学者无不藏书，藏书者无不是学者，其区别仅在于数量之多寡。藏书文化的意识已牢牢地树立，藏书文化的精神得到极大的发扬。不少学者为了丰富所藏，不惜移居书市附近，以便捷足先登，搜求到佳本善刻。当时声名卓著的学者如王士禛、罗聘、孙星衍和黄丕烈等都在京师旧书集中地附近居住，这无疑是推波助澜地使慈仁寺、琉璃厂成为最大最集中的藏书文化的中心而历久不衰。学者们在这里交流藏书，传播文化，培育人才，研讨学问，从各方面研究图书，于是版本、校勘、目录、辑佚等专学相继出现，逐渐完善，成为清学的主要部分。不仅如此，若干富商巨贾也被藏书文化的洪流卷进去了。他们毫无吝啬地藏书、刻书，养士编书，对藏书文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由于全社会能从仁人爱物的角度来重视藏书文化而把藏书文化推向了鼎盛。

以仁人爱物为中心而构成的藏书文化，对社会、民族素质的影响很大。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板块移动和撞击的波及，不仅藏书文化的观念逐渐淡漠，而且藏书词汇也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接近消失，这是一种非常可怕而严重的反文化现象，非常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来提倡和宣传以仁人爱物为中心内容的藏书文化！

中国近代图书范围的扩大

历代公私藏书多以四部及丛书为主，间有其他，亦为数不多。近代以来，学术门类日广，著作者的视野拓宽，外来文化的不断输入，致使图书的种别与数量大为增加，主要是译书和有维新与革命思想内容的书刊。译书从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他借助于政治条件的便利，广泛地搜罗翻译人才，大量翻译西书西报；友人魏源主要根据这些材料相继纂成《四洲志》和《海国图志》开启了研究西方、介绍西方的风气，许多有关西方史地内容的图书出现了，如《瀛寰志略》、《中西记事》、《通商始末记》等即是。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时期，译书活动达到高潮，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政治、科技等方面尤为集中，如洋务运动的三四十一年间，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

译书近千种。在戊戌变法前夕，维新派人物更推波助澜地把译书活动更推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方；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为原则，但实际上仍以西书为主。如王韬译有《格致西学提要》、《普法战纪》等。英国浸礼教派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五六年间共出版了《泰西新史揽要》等译著三十余种，特别是著名翻译家严复在 1898 年以来的十余年间先后译有《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等八大名著。林纾也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据《译书经眼录》的统计，二十世纪的前五年出版的主要译著共 25 类 533 种，约为前 60 年译书量的总和，其中译自日本的虽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所译图书有 321 种，占全部译书量的 60% 强。大量译书的出版为旧有的典藏增添了新的内容。

另一类具有维新与革命内容的图书也风起云涌地出现，最先是太平天国图书，太平军自在南京建政以后，就注重出版图书工作，设立刻印图书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实行“旨准颁行诏书书目”制度，最多列有二十九部。这些革命图书在其失败后，虽多遭禁毁；但尚有流传海外，后经学者抄回者。六十年代以后，维新分子大量著书立说，鼓吹改良，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马建忠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著有若干具有维新变法内容的图书行世。二十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展开，革命书刊盛行一时。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白浪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等等以及明末清初一些反清思想家著作的重行出版，为图书的典藏又增添了新内容。尤其是报刊的大量编印，除改良与维新两派进行对立宣传的《民报》和《新民丛报》外，尚有其他革命派所发行的报刊

更如雨后春笋似地破土而出 如《中国日报》、《开智录》、《浙江潮》、《云南》、《晋乘》等等。它为图书馆的典藏别开生面，从此，书刊成为典藏中相沿至今的两大类别。

第三类是教科书的编印出版。1897 年南洋公学首先编出的《蒙学课本》是中国近代自编教科书的始创之作，但不甚理想。以后，无锡、上海等地相继自编教科书，但或不合使用，或被迫停止流通而未得发展。1907 年清政府学部编辑出版了《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数种，因内容守旧，不为社会所欢迎。直至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教科书》，才使中国的教科书形式趋于完备。商务印书馆在 1904 年—1906 年间曾在张元济、高梦旦创议和主持下按新学制编印了《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和《最新小学国文教科书》等 风行一时。不久 高梦旦从日本考察归来后，在张元济的支持下，并邀请日人参加，大力开展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先后编出高初小需用的国文、修身、珠算、地理、历史、农业、商业等教科书，总名曰《最新教科书》。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旧的儿童读物的否定和革命，体例严整，文字浅近，意义明切，图画精多，并配有教授法，成为形式完备的教科书。这一新生事物不仅对中国近代教育有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做出了贡献。

由于有以这三类为主的图书和刊物的较大量涌现，使图书所涉及的范围扩大，从而为典藏工作开拓了更大的入藏余地。

不可忘记的黑色数字

这黑色，不是普通的黑色。这是千百万中国人民和将士的鲜血、碧血流渚成的颜色，是苦难和愤怒而表示沉痛的颜色。史家运转如椽之笔，蘸着这黑色的血在覆盖全球的大书上，在 12 亿炎黄子孙的心上，写下一连串作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纪年：1895、918、128、77。这些数字既揭示着强暴耻辱，也显示着中国人民抗击、奋战和觉醒。接着又写出了 300000、731 等等黑色的数字。这已无法让史家再冷静地去分析一件件历史事件，或仅仅愤慨地去贬斥罪恶，因为这些黑色的数字散发着阵阵血腥在刺激着具有良知的人们流泪、抽泣和无法抑止的痛哭，泪眼婆娑地只看到这些黑色的数字已经像一把把黑色的尖刀在善良的中国人心上刻画戳刺，鲜红的热血在流淌。虽然，看它会使

人们的心房颤抖快搏，但是我们不能像那些做了坏事却胆怯地不敢睁眼的人那样，紧闭双眼，捂严耳朵，只留下一张嘴，发出呓语谰言；或者有意混淆黑白，伸出血红的舌头妄图从黑色数字的后面舔去几个零；或者喷射出战争双方都有责任的毒焰；或者从牙缝中挤出咝咝“遗憾”之声……可我们却擦干了民族的血迹，抹去了未干的眼泪，睁大了眼睛，死死地盯住这些黑色的数字，深深地看清这些黑色数字所辐射出来的血、泪和火。

731

偶尔拧开电视机，一幅幅野蛮恐怖的画面呈现在荧屏之上：一群群头戴小檐军帽的日本士兵在分散追捕着四处奔逃的中国无辜百姓，一辆辆军用卡车拥挤着穿着破烂军装被俘的中苏官兵，一列列闷罐车填塞着从四面八方掠取来的反满抗日者。他们汇聚成长长的人流在刺刀、皮鞭的驱赶下迈进标有 731 黑色字样的鬼门关，被抛掷进一间间狭小污浊的木笼中。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的所在地 是罪恶昭彰 臭名远扬的 731 细菌部队的魔窟。

731 细菌部队的创建者石井四郎是一个掌握医学知识，却不去济世救人，而丧尽良知，悍然从事与人类为敌的魔鬼事业。他始而打着“防疫”的幌子，作细菌战的研究。在军国主义者的赏识、鼓励和支持下，这项罪恶活动日益猖狂膨胀，并且为了防止在日本本土无意中泄毒，所以建议移往中国东

北。这个建议很顺利地得到军部的批准和支持。1933年8月，日本就在哈尔滨南岗区划定120平方公里为“特别军事区”建立研制细菌的罪恶机构，并命名为“石井部队”。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魔窟设立了各种职能部门和相应的服务机构，还有实施罪恶行动的工作班（刽子手）和实验场（杀人场）。它拥有八千工作人员，年经费达千万日元。以石井四郎为首的这群大大小小的魔鬼就在这座魔窟中鬼影晃动地制造妄图灭绝人类的毒菌。

又一幅恐怖的画面映现在荧屏上，一排尚未完全泯灭良知的日本新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面冲着另一排上身赤膊，下身用破烂布片遮体，双手反绑的中国百姓——他们是不肯接受细菌实验的反抗者。端枪的日本新兵也许是昨天刚从本土征调而来，似乎还没有完全习惯于杀人的勾当，怯懦地不敢直刺过去，旁边拄着战刀的小胡子日本军曹，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一面指着中国百姓，一面狼嚎般地嚎叫着：“また！”“また”！那些新兵在军曹厉声叱责，皮鞭抽打，马靴踢踹之下，把枪刺向无辜的中国百姓——被害者怒目含恨地倒下去了，日本新兵畏缩地后退了几步。……

“また”（中译作“马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威力，为什么要指向中国百姓，为什么又像一道魔鬼的符命呢？我向会日语的朋友咨询后，原来这是“原木”的日语读法。这些杀人魔鬼竟然把他们用作细菌“实验材料”的人们看成毫无生命，任人劈砍的一段段剥去树皮的木头。日本军曹鼓励他的新兵们像劈木头那样去杀人，用这样的办法来培养兽性。在这座魔窟里，被称为“马路他”的“实验材料”据一种统计大约有3000多人。这群魔鬼就在“实验材料”的身上进行种种罪

恶的试验和杀人练习。魔鬼们用注射、埋人和口服的方法把霍乱、鼠疫的毒菌从“马路他”的躯体上获取毒力效果，甚至把一批批“马路他”捆绑在一起，集中在荒原上，由飞机在半空掷细菌弹爆炸以观察细菌弹的“威力”。魔鬼们在细菌试验外，还进行种种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脱水、烧烤和穿刺等实验：脱水是把“马路他”绑在椅子上放入高温干燥室，经过十几小时处理把人变成木乃伊，以测定人体水分的百分比。烧烤是把“马路他”捆好放进破旧的装甲车内，然后用火焰喷射器烧烤，只需十几秒钟，这些活人就成为焦头烂额的“烤全人”，以检验火焰喷射器的穿透力。穿刺则是把“马路他”分别穿上棉衣、单衣和裸体分队排列，然后用枪直射，以考察不同的穿透性能。当魔鬼们面临覆灭时，还执迷不悟，继续作恶，他们不仅残杀掉幸存的少数“马路他”，更将细菌到处抛洒，使大量无辜居民不明究竟地丧失掉宝贵的生命。

731 部队的罪恶暴行比影片《辛德勒名单》中德国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731 这几个黑色的数字是中国人民永远看得清清楚楚的用黑血写成的数字。石井四郎这伙魔鬼的罪行已如实地记录在《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和《细菌战与毒气战》以及其他一些专著、论文和报道中。魔鬼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 731 的遗迹上建立起一座类似西方那种集中营博物馆样的陈列纪念馆，从去年就有这一举措的计划，并很快地付诸实行，这种使国人不忘国耻，奋发自强的义举对人们是极大的激励。可惜不久却因资金不足而中辍，那些热衷于亭台楼阁，歌厅舞榭的有“钱”之士和有关人员似乎无意或无暇及此，颇使人们感到失望与不解。近来

偶听佳音，1995年5月，一些社会爱国人士出于义愤集资补足缺额资金使工程重又恢复，预计“8·15”前可告落成。国人必将感谢慨解义囊的人士和单位。我真希望在这座陈列馆死难者纪念碑前能把石井四郎之流浇铸成赤身跪像跪在那里向惨死的英灵请罪，万劫不复地遭千秋万代的唾骂。

300000

因为从南京转车而有在南京停留一天的空档，我的学生、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事研究专家胡菊蓉女士陪我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去参观。这当然是一项最有意义的安排，而且我还一直没有机会去过纪念馆，尤其是在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时节，更应该去祭告死难的同胞：从甲午以来屈辱半个世纪的中华民族经过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浴血奋战，终于挺身而出屹立于世界。死难同胞的碧血白骨将永世向世界昭告日军的野蛮、凶残！宣告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伟大民族。

纪念馆占地2.5万平方米，馆舍有2500平方米分内外展区。我们进馆后一转身就看到矗立着一面馆名大墙，墙下的花坛里摆满着献给死难同胞的花束。大墙没有太多的雕饰，但是，它像展开着宽厚胸膛的勇士一样高昂地挺立，以一种威武雄壮的姿态，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晋谒者，人们都像在大墙上隐隐约约地看到无数死难者的影像，肃穆地低头默哀，合十膜拜。我更其沉重地悼念，因为我是事变前一年离开南京北迁的，无疑会有我不少学友和少年伙伴丧生在敌人

的屠刀之下，过早地结束了他（她）们美丽的人生！

从大墙侧面的石阶进入外展区；但是，腿刚刚迈上石阶，立即看到迎面的六个硕大的黑色数字：

300000

这六个黑色的数字分别用三种文字注明（中文的“遇难者”、英文的“Vicims”和日文的“遭难者”）使人一见有毛骨悚然的感觉。这六个黑色的数字就是由无辜的中国百姓惨死在敌人枪口刺刀之下所流淌的鲜血，经久氧化而后成为黑色的血所书写。这六个黑色的数字是经过缜密的调查、取证、考核所取得的科学性极强的结论。据一本有中外人士的目睹记录，幸存被害人的证言，报刊的采访报道以及档案文件为依据的专著 其编者在翔实史料基础上概括说：“我无辜同胞惨遭杀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并焚尸灭迹的有十九万多人；被零散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的有十五万多人。”其集体屠杀的场地 查清的有鱼雷营、汉中门外、中山马头、大方巷广场、草鞋峡、下关、龙江口、燕子矶、宝塔桥、上新河、中华门外花神庙和煤炭港等 12 处。据当时曾跳入江中，匍匐江边的目睹者王某说：“一周来敌枪杀者，仅下关沿江，至少在三万人以上。”300000 之数当令人信服；但是，那些屠夫和魔鬼的膜拜者仍在猖獗不休地狂吠：有的嚎叫南京城的户口数啦。试问一个城市的实际人口能与户口簿完全相符吗？世界上哪个城市没有过往游客、流动人口，哪个城市不超员十万、八万、百十来万 难道日本阪神大地震的死者都是户口在册者吗？况且在南京尚有无数的失去战斗力的抗日将士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呢？有的在叫嚣杀人是战争中的正常行为，但是，杀俘和战争结束后屠戮和平居民，

难道也合理吗？也合乎国际公法吗？有的在千方百计地缩小屠杀人数，这真是枉费心机的妄想，即使东遮西掩篡改成万人、千人、百人、十人，也难逃杀人的罪责。

从石阶走上去站在石平台上看到一片开阔的外展区，这就是战犯谷寿夫获取屠夫恶谥的杀人场，是死难同胞万人坑的遗址。一条鹅卵石的路像由累累白骨所铺设。一片如茵的绿草地象征着人类生命的长青。绿白之间划出一条触目惊心的生死一线。一块块遇难者的碑石被发掘出来分立在路边墙侧，真实地记录着死难同胞的数目，我没能逐一的记录，只看燕子矶江滩遇难碑所记，被杀者就达五万余人，人们想见尸横荒滩、血染江流，能不掩面而泣？翳我生民，何罪何辜？

展区的围墙上是三组浮雕：劫难、屠杀、祭奠。艺术家的妙手，生动地再现着父兄受戮，母姊遭辱，母护儿，父掩女，脏腑外流，躯干支解……种种惨象。这已不仅仅是艺术制品，而是中华儿女血肉泪水所写的真实历史。有一座4米高的母亲雕石，右手握拳，左手张开，用力地前推，双眼炯炯，像喷射着一束束愤怒的火焰。这是中国人民的脊梁！草地上矗立着三棵枯树，显示出战争的凄惨。在鹅卵石的尽头是一座棺椁式的展室，展柜中是1985年建馆时挖掘出来的遗骨，一面展柜是铺陈在沙底上的人体的各类骨骼，另一柜则是多具骷髏，有的头颅上有好几个明显的枪眼，证明这是枪杀后掩埋的。室中有块死难者的题名碑，已有二千多人被自己的亲人找到。

内展厅陈列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实展，充足的史料，包括中岛、野田等等侵略分子为炫耀杀人所写的日记、照片，